

第一章 人生天地间

——中国的地理环境与中国的传统社会

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鲁迅书信·附录·致龙炳圻》

一、中国的地理环境与中国人 和中国文化的起源

1. 地理环境与人类

悠悠岁月，茫茫宇宙。

从时间上看，在宇宙天体演化的无尽的流程中，整个人类既有的历史只是极其有限的一瞬；从空间上看，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小的地球，在无垠的宇宙太空中，也真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以数学的极限论的观点看，人类的历史和人类居住的地球这两个有限量分子相对于天体演化史和宇宙空间这两个无限量分母的比值几近于零。

人类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舞台，就像人不能拔着自己的

头发离开地球一样。

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他首先是自然的产物。人由动物进化为人以后，开始了自己的社会历史进程，也仍然离不开相应的自然环境的舞台，而且广义地讲，人类仍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环境仍然是人类生存和演变的第一个前提条件。

“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①

对人类生存于其间的无限的天体的起源的探索，至今还是一门古老而幼稚的学问。不过，对人类的立足点——天体之极为有限的一部分的地球的形成，现在人们已有了一个浅近的了解。而作为这一认识的主体的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的年代和进化的脉络，随着考古的发现和分子生物学的成就，认识已渐趋明晰。

一个多世纪以来，尤其近几十年来，随着新的猿类化石的发现，考古学和古生物、古人类学家根据化石的证据，已把人类从猿的系统分化出来的年代推回到距今约1400多万年，而分子人类学根据分子钟的测算，这个时间距今也有100~600万年了。种种测算的时间的差别，是由客观对象自身的差别和主观测算手段的不同决定的。

人类的生产力愈低下，离动物状态愈近，对自然环境的直接依存性便愈大。人类的生产力愈发达，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愈强，一方面使人类受特定的自然环境的束缚和局限愈小，而另一方面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和利用也就愈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

广，因此对自然的依存面也就愈大。例如，人在登上月球和其他星球之前，就谈不上对月球和其他星球的落脚点的依赖，人对月球上的着陆点的依赖，是人到达月球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人活动的范围愈广，其依存的自然空间也就愈广。所以，科学技术、生产力愈发达，人向自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加强与其说是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的减弱，倒不如说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的深广发展。

愈往上溯，人类主宰自然的能力愈弱，对天然环境的直接依赖便愈强，稳定的天赐丰厚而四季变化很小的亚非热带、亚热带地区成了人类由以演变而来的猿类的故乡。

但是，稳定的丰饶的环境虽然有利于稳定的依赖自然的生活，却不利于变异和进化。“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①在那个洪荒世界，作为自然生物的一部分的人类祖先猿类的进化，几乎完全取决于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其演变的速度只能由自然界进化的尺度来衡量。

距今愈远，猿类、人猿和猿人受自然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愈大，进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距也就愈大，在进化的坎坷历程上，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人们用不同手段对不同的对象测出的人猿揖别的时间相差几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是不足怪的。

古人类学家一般认为人是由古猿进化来的，由猿到人以来的发展经过了五个阶段，即拉玛古猿、南方古猿（或早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

直立人)、直立人(或晚期直立人)、古人(或早期智人)、新人(或晚期智人)。

这五个阶段在现今中国领域内都有丰富的化石和文化遗存的发现,构成了时间上衔接、连贯、没有“缺环”的连续进化和发展的系统。从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人类化石的发现看,在一国范围内这样的发现的丰富性和连续性、系统性是仅有的——当然,在我国的有关发现,也是离现在愈近,其发现愈丰富;愈远,就愈较少见。

同时,人类的发展也是加速度进行的,在古猿阶段演进的速度以千万、百万年计,猿人阶段以十万、数十万年计,古人阶段以万年计,而新人阶段就以千年、百年为计了。所以,人猿和猿人的化石及其他文化遗存的发现虽然比古人和新人的有关遗存少,但由于其进化速度的相对缓慢性,其时间间隔跨度大一些,仍能较清晰地体现出其进化发展的轨迹。

中国境内其所以能发现这样的人类连续进化的化石和文化遗存的系列,首先当然是由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猿类和人类的祖先的生存、活动、进化及相应的文化创造。

那么,何以在中国境域内会有这样的猿类和人类的存在、繁衍、进化和创造呢?

那就是因为中国那时存在着相应的地理环境(包括土壤、气候、各种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等)的条件。

下面,我们就以上述人类演进已经历的五个阶段来具体分析一下中国的地理环境与人类在中国境内的演进情况;再进一步分析这种环境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系。了解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我们再进到对这个社会结构和文化内容的分析，才能有更自觉、更深刻的理解。

2. 中国境内由猿到人的进化

地质年代的第五代即最新一代——新生代的第三纪发生的由印度板块冲击亚洲大陆引起的“喜马拉雅运动”，形成了地壳构造中最新的褶皱地带。在欧亚大陆南部隆起的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向东西延伸，再沿印度洋东、西两岸向南延伸，形成了一个环北印度洋的新月形山区和高原地带，为人类的始祖——人科猿属中的拉玛古猿，提供了一个坐北朝南的圈椅状摇篮——椅背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西侧扶手是以乞力马扎罗山为顶峰的东非高原；东侧扶手是中国西南和缅甸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这些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山地，由于所处的纬度、地形和北面世界最大的山脉和高原的天然屏障，形成了世界上最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山顶终年冰雪覆盖，雪线以下为高山草甸，往下为针叶林，再往下为针阔混交林，再往下为常绿阔叶林，山麓为热带雨林或热带草原。这种立体生态环境正是生物适应环境而变异，使自己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的难得的天然条件。人类第一代人科成员拉玛古猿正是在这种多样的生态环境中找到了自己栖息和依不同环境条件而变异进化的理想乡。如喜马拉雅山南面的印巴次大陆、东非高原肯尼亚山脉地带、中国云南和缅甸境内的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就是迄今人猿化石发现的最主要的集中区域。

猿类向人类过度，经过了漫长的历程。在中国云南发现

的约800万年前上新世早期的拉玛古猿，是最接近人属的由猿到人的过渡类型化石，在湖北郧县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则为公认的人类直系祖先。

由第三纪而进入地质年代的最后一纪——第四纪（即约从距今400万年前至今），地球上便开始出现人类祖先——真人。“人为万物之灵”，故人们便把这一纪称为“灵生纪”。这一时期人已能仅用两条腿直立、走路，把双手解放出来了，因此古人类学家便把地球上的这一代人科成员称作直立人。直立人开阔了视野，两手专事劳动，大大加快了手、脑的发展。截止1981年底，在中国各地已发现的200多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代表了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①。1987年在中国云南元谋新发现的也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约400万年前的猿人遗存（包括最早的石器），1987年在元谋发现的220~250万年前的“东方人”^②，60年代初发掘的华北180万年前的山西西侯度文化遗址和1986年发现的四川巫山猿人，早已闻名的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110~115万年前的陕西蓝田猿人^③，都能制造和使用打制石器，属旧石器时代的早期的初级阶段，也是人类社会蒙昧时期的早期阶段。研究者们根据西侯度文化中发现的烧骨和元谋人遗物中的炭屑及烧黑的骨头，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为人类“火文化”的黎明期。10~20万年前的北京人的石器的制作已有明显的进步，能制作多种工具，已经具有管火的能力，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级阶段。北京人的平均脑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693页。

② 对这一发现的鉴定，考古界尚有争议。

③ 《蓝田猿人距今已有110万年》，《光明日报》1987年4月16日。

量为1043毫升，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从社会发展看，这时人类处于蒙昧时期的中级阶段，血缘家庭已经出现。从旧石器时代算起，在中国境内已发现的人类的文化史已达400年以上，其范围由西到北至少包括长江、黄河、海河等大河流域。

3. 由蒙昧到野蛮

往下一二十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由直立人到现代新人过渡的早期智人即古人的化石发现，在我国已见于东西南北中各地区，如陕西的大荔、山西丁村、北京周口店、湖北长阳、贵州桐梓、广东马坝等等。此时打制石器已有所改进，原始群过着采集和渔猎生活。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最后阶段。社会发展为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母系氏族公社开始出现。

到距今10万年至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即新人化石的发现，更是遍布从内陆到台湾的全国各大区，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各大流域。经过四季和多次冰河期与间冰期气候及其他环境变化的反复考验，世代续存下来的智人在与严酷的自然斗争中发展了自己应付环境的能力，使自身得到了改造和进化。这一时期打制石器已有了进一步改进，开始出现磨制石器，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4万年前以后为晚期）。从石器的种类和造形等各方面的发展看，文化发展趋向多样化，人们仍以采集和渔猎为主，到这一时期的末期，大约距今万年前左右，在中国已出现种植业和养畜，母系氏族公社继续得到发展。中国是人类最早的农业发源地之一。

到了七八千年前，中国东、西、南、北、中，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到1981年已发现700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作过发掘的有400多处。这些文化显示出明显的地域性色彩，分属30多个考古文化，被划为十几个文化大区，十几个文化系统。此时磨制石器已广泛使用，并能制陶和纺织。如发现于甘肃的距今约8000年前的世所罕见的彩陶，发现于湖南的7000年前的夹砂红陶，就是新石器时代北方和南方较早的陶器的见证。这一时期，人类从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过渡到了农耕-畜牧生产经济。距今7000到5000年前的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同一时期的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其经济生活都已以农牧为主。同时北方和南方的经济生活也显示出分明的地域差别，如农耕，北方以种粟、黍一类耐旱作物为主，南方以种水稻为主^①。后来一系列文化都继承了这个农业传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面貌有渐趋一致的倾向，反映了当时诸文化的交流影响及其融合统一的趋向。这时处于中国东部大河流域的中心地带的中原地区日趋突出，发挥出先导作用。农业和畜牧业为定居生活提供了较可靠的稳定的生活资料，因而更有利于人口的繁衍和文化的积累，与此同时，也就开始形成农业民族固有的守土重迁、求安稳的保守生活习惯和心理。新石器时代的社会

^①在西亚和欧洲，农耕与金属器尤其与铁器的发明和运用是分不开的。而在中国，远在金属器发明几千年前，在新石器时代，北方黄河流域与南方长江流域都已进入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经济社会。我以为这是因为北方黄河流域有广阔、丰厚的黄土层，主要为马兰土，其质地构造为大孔性垂直节理，易于挖掘，而当时主要的作物为粟、黍等浅根草本粮食作物，木、石、骨质等非金属农器即可耕耘，南方长江流域的水稻，种在田里，水泡泥软，也便于耕作。所以中国铜、铁器的发明运用晚于西亚，而农耕的产生却不比西亚晚。

形态为氏族公社制由全盛走向衰落。新石器时代的前期为母系氏族社会的顶峰期，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为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期，到后期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确立，社会已向阶级社会转化，即由野蛮向文明转化了。

下面以仰韶文化为例来看一看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初始的特征。

仰韶文化形成和分布于黄河流域，延续约两千年，不断吸收周围诸文化因素，同时又向周围文化辐射，与周围文化互相影响，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仰韶文化经济生活的基础，是原始的耕种农业，采集、渔猎和中小家畜（猪、狗）、家禽（鸡）等的饲养为辅，生产水平处于农业文明的起始的低下阶段。农耕主要由妇女承担，她们还从事采集、制陶，并抚养子女，料理氏族内集体生活的各种事物，担负着社会的主要职能。男子在生活资料的获取方面其渔猎所得的动物不及妇女的种植、采集植物及家畜的驯养稳定；在人的自身的再生产方面，处于原始社会的族外群婚状态，人们连父亲是谁都不知，生养抚育子女的妇女当然地享有至尊的地位，成为氏族的经济生活和血缘情感的首领和中心，从而形成了“公^①天下”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母权制。从当时的葬制中的二次多人合葬（有的是一具女尸为一次葬，而其他的男性骨架则是迁来同她合葬的）、女性厚葬、母子合葬等，可以看出当时以女性为中心和母性的权威。仰韶文化早、中期正是中国历史上母系公社制的繁荣时

^① “公”字从“八”从“口”，“八”为分，“口”为丁。丁即人，“公”就是人分，由女酋长主持公平分配。

期^①。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大雅·生民》开篇便道：“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乃禋祀上帝于郊谋，以拔出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男神由女神产出，而女神姜嫄无夫，正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中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婚姻状态和亲子关系。

《商君书》、《吕氏春秋》等许多典籍中也记述了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用鲁迅的话说，便是“娘儿们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那时的祖老本太太大概比后来的族长还要威风。”^②

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关于神、人起源的创世神话——女娲神话中的造物之神也是女性神。把神、人和万物的最高创造者归于女神，亦足见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的崇高地位及对原始神话的决定作用。关于女娲的神话，首见于《山海经》。《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女娲用她的肠子化作十神，“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之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汉应劭《风俗通》说：“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组人也。”黄土造人，自属荒诞，但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因由，反映了历史进程和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如造人者为

①据1988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考古专家根据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出的文化遗存断定，6000年前中原地区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8000余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男子就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并且已是这个生产部门的主要力量。因此对我国仰韶文化时期的社会组织、经济形态和各地的发展的不平衡性，需重新认识。

②《准风月谈·男人的进化》，《鲁迅全集》，第5卷，第283页。

女性，则是符合“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的女性的地位和“人是女人生的”这一人们的粗浅直观的生育认识（原始初民尚不知性交与生育的关系）的。按照原始初民的物活论和万物有灵论的观念，人俑就是人的化身。因此，不独中国古代神话，在古埃及神话、原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及其他宗教里，都有类似的人神、上帝用土造人的说法。“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我猜想是受启发于在新石器时代流行的绳文陶器。这种陶器有压印的绳纹（其制作法是在细木棒上用绳子缠成中间粗两端细的轴状工具，在陶坯上压印成排而整齐的绳纹），而且当时陶器的制作主要由女子承担。正是这种生产实践产生了相应的女娲“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的神话。鲁迅则根据这一神话传说，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历史小说《补天》（原名《不周山》）。

有的学者甚至还认为，“传说中黄帝时代的生活，在半坡遗址中大都能找得出来。这说明黄帝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公社，黄帝至尧都是母系公社的女酋长。”^①

与史书和神话传说及遗风遗俗相照应，而且更有直接说服力的还是出土文物。近年在辽宁西部发现的5000年前的文化遗址中的女神庙、陶质和泥塑的妇女裸体像、女神彩头像进一步向我们展现了母系氏族社会中人们对女性的景仰。

4. 从野蛮到文明

母系氏族社会延续的时间其实比迄今为止的男性专制的

^①郑慧生《我国母系氏族社会与传说时代》，《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时间长得多。但是随着生产的发达，生产工具的新发明和改进，磨制石器的发达，石质农具如石锄、石镰等的出现和强化，耕作技术的提高，大牲畜的饲养，畜牧业的发展，在需要投入更多更强的劳力的种植业中，男子逐步代替了女子，同时男子也成了驯养大牲畜的主要劳力。这样，女子和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逐步易位，女子便从生产的第一线退居第二线，从户外劳动转为主要从事户内生活服务。女子的权威和自由相应渐渐丧失，逐步由全面主管变成主内，最后连“内”也做不了主，变成了家奴。这便是恩格斯所说的：“女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①

中国由于地域辽阔，各地社会发展不平衡，进度相差很远。既有的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5000年前，就已可以看到这种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征兆。《诗经·大雅·生民》中写道，男神后稷由女神姜嫄生出后，刚满月便大显神通，会爬以后就能种庄稼，成人后更极尽农艺之能事，反映了男性取代女性成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承担者。民俗学家孙作云、张紫晨都认为，这首诗反映出了原始氏族制度从母系到父系的变化^②。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300~4800年前的龙山文化，考古学家们已公认为属父系公社制^③。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69页。

②参见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和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

③有的论者甚至认为传说中的尧就是母系社会最后一位氏族联盟的男首领（参见郑慧生《我国母系氏族社会与传说时代》，《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黄河上游甘肃、青海一带发现的约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已显示出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向奴隶制转变的明显特征。恩格斯曾指出，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烈的革命之一。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属于这一革命时期。

也正是在距今大约5000年前左右，中国的象形文字逐步形成，出现了可以识读的甲骨文，在龙山文化中已出现了卜骨。中国最早的占卜书《易》，把阴阳、乾坤看作演化万物的最高、最根本的矛盾关系，“阴阳合，万物生”，“刚柔相推，变在其中”，而且把阴放在前头。《老子》中对阴阳的矛盾也十分重视安弱守雌，充分发挥了以柔克刚的辩证法。我认为，这首先是对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过程中这一对矛盾的双方长期交互作用的矛盾运动的概括和总结。男女两性的矛盾不同于部落与部落之间、氏族与氏族之间的矛盾和战争，部落、氏族可以通过战争消灭对方或吞并对方，而男女两性的关系，对立斗争可以使支配地位易位，但终不可分，不可消灭对手。因此《易》的基本精神还是阴、阳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具有浓厚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既然女子在户外劳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的主导权和支配地位被男子所取代，男子成了主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者，自然也就取得了产品的支配权。这样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增加，男子又自然而然地也成了这种剩余产品的拥有者。这就是私有财产及其控制权的出现。这种男性家长是绝不肯让与己无关者来继承这份财产的。于是，无论父系氏族的财产的承继，还是血统的承继，他都要求能有确定无疑的属于他的血统的子女。这就要求一定的女子成为他的固定的妻子，而不与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男子既然成了财产

的支配者，他自然也不能再离开本氏族外就女子，而要以氏族主人的身分把女子娶过来，妇女就成了在男人支配下为丈夫生育血统延续和财产继承人的工具。所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与父权制的形成和向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形态的过渡是紧密相连的。

父系氏族公社中生产工具继续改进，约在4000年前，中国开始出现红铜器，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生产力继续发展，使劳动生产群体得以缩小，导致氏族中以大家族为耕作单位的出现，并越来越经常化，使父系大家族成了父系氏族公社的相对独立的基本经济单位。这样由父系氏族又向父系大家族迈进了一步。

父系大家族内的成员既有家长支配下的自由、半自由人，也吸收外族的人员，尤其是战俘奴隶。家族的发展导致氏族公社的瓦解，奴隶制在氏族公社的崩溃中出现于历史舞台。

氏族公社中的强大的占支配地位的家族，在奴隶制拉开序幕后便演变为奴隶主贵族登堂了。奴隶主贵族对奴隶的主宰权自不待说，同时对其子孙和妻妾也拥有支配权，这就是奴隶制中的父系家长制大家族制度。

由财产的世袭而导致政治权利的世袭，这是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在政治上的重要演变。《尚书》记载了在氏族社会中氏族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经部落联盟议会（即“四岳^①”联盟的各部落首领）推选“禅让”、“传贤”的故事：由尧而舜，舜而禹，而到了禹便开始“传子”了。由禹的儿子启建

① “岳”即山头，中国的山头主义的历史久矣哉！

立的夏便是我国历史上进入文明史以来的第一个大朝代（约距今4100~3600年左右）。

二、中国地理条件和中国 传统社会文化的特点

1. 环境的广阔性和多样性与文化来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中国现今领土面积的精确测量数为1045万平方公里^①，仅次于苏联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由于土地辽阔、地形复杂，各地距海洋远近相差很大，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它不仅为由猿到人的进化提供了必备的条件，而且使自猿进化到人以来，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因地、因时、因气候及其他物质条件和生态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文化。

据近年对中国人的血清血型的研究的最新成果发现，中国大体以北纬30度为界，南方人和北方人在遗传基因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这一差异的形成，需要约200万年的时间。这证明中华民族至少存在着南北两大发源地^②。前面我们已讲到在南北各地发现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的明显的地域差别。在新石器晚期，中原文化的先导地位开始突

①我国领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这一说法一直为人们所沿用。最近经最新科学度量结果，我国领土总面积为1045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940万平方公里，岛屿75400平方公里，滩涂12700平方公里，内海693000平方公里，领海22万平方公里（《信息日报》，1986年4月20日）。

②赵桐茂等《中华民族的起源：四十个中国人群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分布》。

出。不过，自进入文明史以来，地区文化差异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有些地方特色还得到继续发展并获得了历史的稳定性。这就是各地区文化的趋同和变异的二重性发展：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位于北方的燕山-太行山区和海河流域的燕赵文化与位于最南方的南岭-珠江流域的百粤（百越）文化的巨大差别；而且同是长江流域、并处于大体同一纬度上的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以及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也存在显著的差别，更不用说边疆少数民族的游牧、狩猎文化乃至原始文化与中原和沿海地区的农业文化的差异了。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这种文化的物质外壳的表现形式——文字在秦以后达到了高度统一，但文化的来源和以后的发展仍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仍是在差别的基础上趋同，在趋同中有变异，在变异中又有趋同。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主要是体现在地域（地缘）和文化心理上；而在血缘和体质上，大地区之间的差异仍是明显存在的。这是因为生理上的差异形成的历史过程更久远得多，也就更稳定得多，而各地区之间的古代交通的不便、人员交流的困难，则使这种差别长期存续下来。各地经济生活的差别，就经营性质看，自古主要是农区与牧区的差别；就经济发展水平上看，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到唐安史之乱（公元8世纪中期）以前，是北方黄河流域高于长江以南地区，而自此以后，江南地区逐步超过北方。到近代，东部沿海商品经济先发，中部次发，西部后发，遂形成了自东向西逐渐降低——与地形上自西向东逐渐降低正相反的差度格局。中国东西走向的山川分隔成的南北人的差异，从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看

都是显而易见的。从体质人类学看，从血清血型到体质形态，都存在明显的南北异形。从文化人类学看，甚至同一种戏曲，在南北各地由于受当地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也发展成明显的不同特色。这种差别经过长期积淀，深深影响着不同地区的人的文化心理、性格和风俗人情。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昆曲，元、明起源于江苏的昆山，先流传于江浙，在清代，江浙一带的“南昆”舒徐婉转，细腻抒情，如涓涓清泉，有“水磨腔”之称；传到风沙扑面的北方，便发展成粗犷、豪放、高昂并有武打的“北昆”。近现代文化上“京派”与“海派”的差别，则更具有时代和地区社会风气的特点。鲁迅在分析中国北方人和南方人在性格和气质上的差异及各自的优劣（二重性）和互补关系时有一段极精彩的分析，他说：

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①

由于对史料的掌握和对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不同，时下史学界有些论者对中国社会发展到底经历了哪些阶段尚存质疑。我对这个问题尚无成见，我认为分析历史就是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根据事实说话。从我国的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历史典籍的记载、神话传说、留存至今的遗风遗俗，及其他后进民族的种种社会现象对照进行综

① 《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435～436页。